臺大歷史系博士論文摘要（99 學年度）

冷戰、國家建設與治理技術的轉變——戰後臺灣宏觀經濟治理體制的形成（1949-1973）

陳思宇

本研究旨在藉由敘述一種新型態「經濟行政體制」形成的曲折故事，重新拼湊 1949 年以降臺灣「國家體制建設（state-building）」的歷史圖像；另方面，則跳脫偏重於「戰爭」的「軍事衝突」層面，或僅視「戰爭」爲一種「國際關係」形式的既有研究框架，運用「組織與制度」演化的研究取徑，進而反思「全球冷戰（the cold war）」與中國內戰（以下簡稱內戰）的歷史進程與內在意涵。

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圍繞「戰爭」與「國家建設」二者的相互關係，採取多元的思考路線，組織歷史演變的「敘事情節」，嘗試說明在中國大陸遭逢軍事潰敗幾近崩解的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在混亂中遷移至臺灣這個原屬日本殖民地的邊陲島嶼，甚至在美國霸權的各種支援下，通過「模仿－移植」美式行政治理的思維與技術，展開一系列國家建設工程。而由一個原爲統治中國廣闊領土與眾多人口而建構的龐大機器，演化成一個以治理島國臺灣爲目標，並且融入美國全球體系的「新」國家。

如眾周知，專業的官僚行政組織乃是維繫現代國家治理的核心機制，此種新型態的組織運作方式，透過一連串模仿、移植的過程，由西方向各地擴散，而在全球掀起幾波「國家建設」的風潮，並且伴隨國際關係的形成，共同構成現代國家體系，亦成爲形塑當代世界面貌的重要力量。每一波現代國家組織體系的擴張，多半與大規模的戰爭有密切關係。戰爭除被定義成是發生於國與國之間的軍事衝突，亦被視爲是一種國際秩序與社會活動的「異常狀態」。戰爭引發的大規模破壞與軍事需求，迫使參戰各國必須調整組織型態與治理方式；當軍事衝突告一段落後，各國若試圖恢復社會活動與秩序，通常必須先著手重建各種不同機能的行政機構，方能協調社會運作。然而，「國家重建」理論上是企圖使國家體制脫離以軍事動員爲主的「戰時狀態」，而重回「常態」，但實際上，在重建國家組織的過程中，大都融合許多在戰時發展出的新知識與治理技術，重建國家體制的過程，往往亦是建造另一種「新」國家的過程。因此，「戰爭塑造（war-making）」與「國家體制建設（state-building）」不僅有密切關係，甚至可視爲是一體的兩面。

本論文指出，戰後臺灣的國家建設，乃是一項與「全球冷戰」同步進行的艱鉅工程，這既是現代史上第一次以臺灣爲領土範圍建立完整國家治理體制的嘗試，同時也是「中華民國政府」展開蛻變的歷史故事。

（指導教授：陳永發；2011 年 1 月獲得博士學位）

日治時期臺灣唱片流行歌之研究——兼論一九三〇年代流行文化與社會

黃裕元

本研究統整與考訂零碎紛陳的三〇年代唱片業與流行歌史料，並初步分析現存之歌詞、樂譜與錄音資料，從唱片流行歌界的詞曲創作者、歌手、詞曲與音樂風格等面向，探討三〇年代唱片流行歌的發展與特色。在歌曲發展史的基礎之上，再綜合市場概況、社會議論的資料，包括詞曲創作者的概念、社會觀察家的評論以及總督府唱片管理制度的影響，藉著流行歌界與社會受眾的互動，呈現其社會文化意涵。

「聲音的印刷術」——錄音與唱片製造，隨著二十世紀的展開而不斷進步。聲音成爲可複製傳播的資訊，也成爲有利可圖的商品，掌握相關技術與資金的唱片公司四處找尋具有市場價值的聲音。本土藝人從兼差性質地參與灌錄，進而參與發行、販售的工作。三〇年代之後，受日本、上海等流行歌市場的刺激帶動，出現以本地多數族群語言——「臺語」演唱的唱片歌曲，從西洋管弦樂伴奏的民謠長歌開始，逐步定型爲形式較短、多段歌詞的創作歌曲，配合電影與唱片公司、販賣點的宣傳活動，展開「流行歌」新紀元。

從歌壇人士與詞、曲、演唱和音樂內容綜合觀察，本土唱片流行歌在誕生初期帶著濃厚的都會青年性格，並以爵士樂、愛情爲歌曲主題，而廣獲都市摩登青年的喜愛，而後新創短歌的格式逐漸定型，歌詞與音樂內容也逐漸向歌仔、南北管與山歌等本土歌樂文化傾斜。於是唱片歌曲的創作界與新文學、西洋音樂界間固然有人員與作品的交流、互動，其創作慣例與生存法卻有所不同，他們對社會上流動議論的現象與觀念，也自有其一套詮釋的慣例。

就流行歌的內容與社會文化而言，許多關於都會文化的歌曲，吐露出臺灣人對「現代」、「摩登」、「毛斷」所帶來的新穎社會現象的矛盾情結。開始是以新奇的眼光端視，尤其對所謂「烏貓」、「烏狗」的街頭奇景深覺趣味，狂歡與閃躲過後，表現出更多的孤寂與疲憊，對人、事、物快速流動的都會生活表達深刻的無奈與反感。而在愛情抒情歌曲當中，自由戀愛的信仰確已深植青年世代，但男女互動的描述卻趨於空洞，在世代觀念變遷的夾縫中，自由戀愛與其說是新社會觀念，不如說是流行文藝家們編織的、迎合青年們的綺麗夢想。

此外，二〇年代政治運動喧騰以來，本土政治運動者標舉的「臺灣」群體認同，以及對「亞細亞」或「東洋」的和平扮演的關鍵角色等認同與主張，在三〇年代流行樂界獲得傳誦，1937 年中日兩國政府全面交火後，「東洋」或「東亞」更儼然成爲新流行語，包括「新東洋音樂」的概念，以及「咱是東洋人」的聲明。而相對於日本歌壇，臺灣本土流行歌對戰局的反映冷淡，自陳要促進日華親善的臺灣人，面臨時局的變化卻也

只能無言地旁觀。

當本土歌壇解散後，臺灣人只能成爲配合國策的演出者，回到野臺去找尋新的身分、定位與生存方式。熱鬧多元的第一代臺語流行歌，就在喧騰的軍歌之間，悄悄地走下了舞臺，然而他們的創作與演出，不僅奠定近代歌唱文化的基礎，更爲世世代代臺灣人留下至爲珍貴的文化資產。

（指導教授：吳密察；2011 年 7 月獲得博士學位）

國家與邊區社會的治理——以中北部臺灣金廣福、廣泰成墾號為考察中心（1834-1920）

賴玉玲

自臺灣收歸版圖，清政權在中央財政乏力中展開對臺灣的治理，從康熙六十一年（1722）制定番界，執行過程顯示清朝的臺灣邊疆政策未能遏止漢人越界侵墾，以致邊陲衝突不斷。清代做爲漢人和原住民區隔的「界」，經過不時清釐或重定，成爲土地拓墾和國家版圖擴張的前線，並不斷往內山推移，逐漸形成漢人爲主體，進行土地拓墾的邊區社會。本文在清代臺灣以界做爲人群區隔的邊疆治理基礎下，由道光十四年（1834）官方諭令籌組金廣福墾號，實施較爲積極的隘防行政爲始，採取金廣福到廣泰成墾號不同時期作用於新竹、苗栗地區的官民合作拓墾組織，做跨區域、貫時的分析和比較。

根據傳統封禁、分治和隔離辦法，臺灣邊陲設立的人群區隔被清廷作爲鞏固清政權、限制漢人活動，以及調整漢番關係的最後防線，由最初鬆散的人群區隔，到逐步建立固定武力的防備線。另一方面，臺灣邊陲邁向水田化過程，政權未能有效規範的邊區，國家的治理透過官民合作和擴大地方代理體現。受國際市場和經濟利益影響開放番地，清廷逐步展開與邊區種種合作，使十八世紀末的隔離政策到十九世紀已經呈現消融，邊陲控制必須倚恃邊區的協力來實踐。

由於內層山面以樟腦利益爲重要開發目的，清末金廣福和廣泰成墾號的設置，就在人群關係緊張和山林資源開發背景下，展現官民合作和擴大地方代理的統治技藝。金廣福墾區以客籍移民爲主體，並且以與墾首原鄉相同祖籍爲優勢，到廣泰成墾區內不同認同的地域區形成，除卓蘭明顯以宗族型態發展外，其餘區塊在客籍爲認同指標下，藉拓墾整合，呈現擬血親擴大宗族關係，都表現邊區的地緣社會發展特色；而墾首影響力與山林資源開發因素，或許也可爲臺灣客家人群聚近山地帶的發展，提出新思考。

（指導教授：許雪姬；2011 年 7 月獲得博士學位）